



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丛书

南开人物志

NANKAI RENWU ZHI

第一辑

■ 南开大学办公室 编

NK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人物志 第1辑/王文俊主编.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10

ISBN 7-310-01344-1

I. 南… II. 王… III. 南开大学-名人-列传-中国 IV. K820.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328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电话:(022)23508542

出版人 张世甲

承印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 - 3000

定价 29.00 元

前 言

值此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我们结集出版《南开人物志》第一、二辑,谨以此书献给八十周年校庆。

南开大学创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创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私立大学典范。经过八十年的奋斗,特别是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与发展,南开大学办学成就卓著,声名远播,已成为当代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为我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南开事业的成就,南开精神和传统的形成,是一代代南开人自强不息、拼搏奋进的结果。南开一向名师荟萃,学者云集,他们以服众的人格,精深的学识,传道授业,竭诚奉献;南开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秉承“公能”校训,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生力军。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南开人的杰出代表。

发掘、整理和认识这种传统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为了讴歌先驱,激励当代,垂范未来,这对于在新世纪继承和发扬南开精神和传统,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学校决定,编写《南开人物志》,分集陆续付梓刊世。

《南开人物志》按学校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编辑。历史人物的人选以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先行者、对南开创建发展有卓越贡献者、学术精深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的人物以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知名教授或毕生献身南开教育并被公认有成就者为主。第一辑侧重于建国以前;第二辑集中反映建国后 17 年的人物。第一辑曾于南开大学 75 周年校庆时出版,此次重新做了调整改写,并增补了一些人物传略。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第

一、二辑中未及收入的人物,以后酌情补编。

《南开人物志》第一、二辑由王文俊主编,梁吉生、宋秋蓉协编。

在这两辑《南开人物志》成书过程中,得到学校和各院、系领导以及校友、师生的指导、关心、支持和帮助。此外,也吸收了一些书刊的有关内容。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有一些疏漏、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南开人物志》第一、二辑的出版,得到浙江东港集团王云友董事长的慷慨赞助,谨表深挚谢意。

编者

1999年9月

目 录

严 修	梁吉生(1)
张伯苓	郑致光(7)
周恩来	刘 焱(22)
于方舟	窦爱芝 刘玉芝(32)
梁启超	范绪锋(41)
姜立夫	张洪光(46)
邱宗岳	杨光伟(55)
饶毓泰	张洪光(61)
徐 谟	程同顺(70)
司徒月兰	卢会敏(75)
伉乃如	王月华(80)
张彭春	崔国良(87)
杨石先	王文俊(98)
蒋廷黻	宋秋蓉(116)
刘晋年	刘沂年(124)
范文澜	范绪锋(129)
黄钰生	郑 文(135)
钱宝琮	张洪光(145)
汤用彤	刘文英(155)
何 廉	林惠华(161)
李继侗	阎家本 白玉华(171)
董守义	徐 行(178)
方显廷	王淑贵(186)
张克忠	刘辰莹(194)
江泽涵	张洪光(204)

陈省身	张洪光(213)
吴大猷	张洪光(224)
曹 禺	夏家善(234)
殷宏章	王淑芳(242)
冯文潜	冯承柏(248)
吴大业	王传龙(255)
雷海宗	王敦书(260)
蔡维藩	宋秋蓉(269)
陈萌谷	南 天(274)
柳无忌	殷子纯(279)
孟广喆	杨正杰(287)
鲍觉民	曾 涤(292)
陈序经	曹焕旭(300)
林同济	范绪锋(310)
丁洪范	钱荣堃(315)
孙本旺	许 康 苏衡彦(322)
陶云逵	梁吉生(330)
罗大冈	侯林莉(339)
余新民	程永明(344)
潘孝硕	潘士宏 南 迪(351)
李广田	旅 隼(358)
查良铮	王淑贵(368)

严修

梁吉生

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人们高度评价这位 20 世纪的爱国教育家。1929 年,严修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即发表社评,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此后 60 年,即 198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通过议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严峻。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于这种信念,1898 年,严修弃官回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1904 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教育成为北方的先进地区。

20 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严修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

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即于1918年严修赴美参观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集会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

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说道：“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

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不无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1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思源堂（今第二教学楼）的起建，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时称罗氏基金团）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多元，而建筑费的另一半则由河南袁述之慨捐。述之先生系严修好友袁世凯的堂弟。他之所

以“秉承慈命，朝达夙愿”，固然主要在于南开大学“声誉日隆，倾动中外”，但严修与袁氏家族的特殊关系也是原因之一。

官绅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卢木斋是严修的儿女亲家。1927年经严修促成，卢木斋捐出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920平方公尺，外形为丁字型，可容纳读者300人，藏书20万册。1928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校庆之际，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严修等亲临出席，观礼来宾达400余人，成为当时天津文化一大盛事。图书馆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今行政办公楼）。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

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1913年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

周恩来入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胜利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饿之苦,而且

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她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修去世后，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严修的办学功绩，他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严修逝世后，南开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发起捐款，在南开中学兴建“范孙楼”；敬塑严修铜像。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又在中心花园敬塑严修半身铜像，以为永远纪念。每逢他的诞辰或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来这里凭吊。

张伯苓

郑致光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踟蹰,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一、家世生平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其祖父张虔,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致疯狂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父张云藻,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醉心骑射,访求名师,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长琵琶,天津人称之为“琵琶张”。

张伯苓六岁时入私塾读书。白天在义学里念《三字经》、《千字文》,放学回家后,其父再辅以教导和讲解,督促甚严。在这种义学中使张伯苓接触了更多的贫家子弟。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

北洋水师学堂是洋务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植北洋海军人才而建立的。学堂总办是船政大臣吴虞成，总教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的严复。教习多半是留英学生。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清政府为吸引学生，不但学费全免，还管吃管住，这对家境日趋贫困的张伯苓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伯苓在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大开眼界。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驾驶班学生在学堂习完四年毕业，派上练船学习船艺一年，送原学堂再习三月，然后拨入枪炮练船，再学三月。考核及格，派归兵船差遣补用。”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趁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被击溃，于是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战役。9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享率领联合舰队袭击北洋水师，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双方激战五个多小时，互有损伤。张伯苓又随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海军基地。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将士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2月12日敌军占据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随北洋水师舰队开始参战时，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张伯苓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这是张伯苓的爱国热忱受到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1897年，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妄图瓜分中国。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俄、法、德三国以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

租占了广州湾,而英国强租九龙与威海卫。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五内俱裂。他从威海卫归来之后,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海军军舰全军覆没,这次大失败的教训,激励了张伯苓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当时科举虽还未废,而要求变法维新以求富强,已成为一般有志青年的愿望。张伯苓决心创办新式教育。适值天津名绅严范孙倡办新学,1898年乃延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张伯苓结识严范孙,对其后来南开一系列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影响很大。

张伯苓在严馆执教时期除教授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和理化外,并提倡体育。那时没有体育设施,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教其子侄,是谓“王馆”。

张伯苓在严、王两馆,循环往复,诲人不倦。两馆教法大体相同,只是附读学生逐年增多,设备及教法都还不完备。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

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

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

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

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

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入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

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接着在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

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和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当年九月开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在汉口成立了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拉拢在南方有一定声望的张一麟和在北方颇有影响的张伯苓担任参政会的副议长。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后，目睹国民党政府，政治黑暗腐败，心情很不愉快。年末，他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终日深居简出。

解放前夕，蒋介石三番两次到沙坪坝津南村，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1949年，他毅然留在重庆迎接解放。解放后，他衷心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其内外政策。1951年2月23日因病逝世，享年76岁。在他的遗嘱中，对国家民族无限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勉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务共努力”，“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作为在他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